

第二輯

第七種

黨治訓育叢書

于右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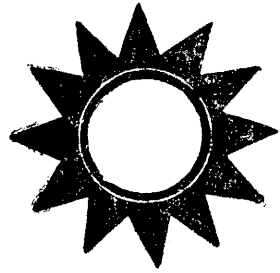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6264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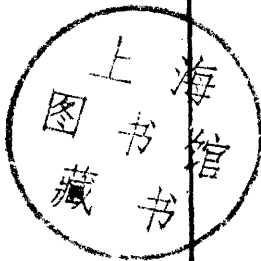
第二輯第七種

總目



中國國民黨史概論

汪精衛



黨治訓育叢書

133450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123450

1514763

中國國民黨史概論

汪精衛講授並手自記錄

導言

兄弟覺得對諸君講授中國國民黨史，實在有點困難，因為我們現在還未能夠有一部完全的黨史，而做黨史這件事情，也確實是不容易的，大概總要經過下面的三種手續，方纔有箇頭緒。第一是蒐集史料，先把一切關於本黨經過的事實，蒐集起來，作為黨史的材料，所謂材料，決不能單靠着文字的記載，於文字的記載以外，還有許多事實，留在同志的腦海裏，必要假以時日，煩他們將腦海裏的記憶，記載出來，纔能把幾十年來本黨的事實，得較為豐富的記載，這件事情，必須速做，否則一箇同志死了，他腦海裏記憶的事實，也就隨之埋沒。第二是審定史料，我們一面蒐集史料，一面將蒐集得來的史料，加以精密的審定，纔能分別真假，這番工作，比蒐集史料，還要繁難。第三是編纂史料，於審定史料之後，必須將所審定的條分縷晰的綱舉目張起來，然後可以做成一部有系統的黨史。以上三種手續，苟缺其一，黨史便做不成。如今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雖經指定專員，著述黨史，卻因為這三種手續，還沒完備，所以黨史急切還不能做成。在未有黨史以前，講

授黨史的困難，可想而知，何況兄弟在此講授黨史的時間，統共祇有十點鐘，欲在這短少的時間，講授繁重的黨史，實在更是困難。所以兄弟打定主意，不叫做講授黨史，而祇叫做講授黨史概論，所注重的不在各個的事實，而在幾個重要的概念，因為概念清楚，則於黨史已得其綱要。所謂幾個概念，第一是革命運動的時代背景。第二是革命的主義及政策。第三是革命黨的組織及紀律。在這十點鐘內能否將這幾個概念解釋明白，尙不可知，但總要儘先將他講完再及其他概念。諸君須要知道，中國最近幾十年來革命的事實，幾乎可以說是本黨的事實，本黨的名稱，有興中會，中國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而本黨的主義，是始終一貫的。始於本黨總理孫先生之創做，繼以全國人民之信仰贊成，日多一日，中國革命運動，因以日益擴大。所以本黨的運動，便是中國的革命運動，因為除了本黨之外，中國沒有第二個革命團體，這是數十年來顯著的事實。兄弟敢信，諸君明瞭這種關係之後，必然增加對於本黨之信託，同時增加對於中國革命之決心與勇氣。

第一章 中國最近之革命運動之時代背景

這一章要分以下幾節來說明

第一節 革命何以發生

從科學眼光看來，無論那一樁事實，決不會無緣無故，突然發生的，必須那箇環境，需要着那種事實，然後那種事實，纔會發生。革命也是人類一樁事實，決不能逃此例外，所以要知道革命何以發生，必先要知道那時代的環境，是怎樣的。

我們知道，如果那時代不需要革命，則革命決不會發生。祇是所謂需要，有兩種必要條件，方纔顯出。一是怎樣知道需要。二是怎樣得着需要。這最好拿一箇譬喻來說明，一箇人病了，往往不知道是有病，知道是有病了，往往不知道是什麼病，知道是什麼病了，往往不知道怎麼醫法。這三層知識，一層比一層困難。一箇人病了，總覺得不舒服，覺得辛苦，卻往往不知道這就是病，至於知道是什麼病，非醫生不可，知道要怎麼醫法，更非醫生不能。病人是需要醫治的，而對於自己的需要，不容易知道，不容易得着，且如此。國家之有存亡危急，如人之有病一樣。國家有存亡危急時，需要革命，猶人病時，需要醫治一樣。一箇人對於自己的病，尚且不容易知道，何況一國人民，對於國家之危急存亡，如何容易知道，所以有時國家危急存亡，已在眼前，而一國的人民，尚以為太平無事。一箇人對於自己是什麼病，尚且不容易知道，何況一國的人民，對於國家之危急存亡，如何容

易知道根本原因所有呢？所以有時對於國家危急存亡，雖然知道憂懼，卻於國家危急存亡之所，以然，完全是隔靴搔癢。一箇人對於自己的病，應該怎麼醫法，尚且不容易知道，何況一國的人民，對於國家之危急存亡，如何容易知道救治呢？所以有時雖然知道國家危急存亡之所以然，而於怎樣救治竟和病急亂投醫一樣。人病時須有醫生，猶之國家存亡危急時，須有革命。醫生認定病人的病狀，非用解剖手術，不能痊癒，便無疑無貳的要施行解剖手術，但於施行解剖手術之先，必要病人明瞭自己的病狀，知道非用解剖手術，不能痊癒，醫生方纔能夠奏刀，這就和革命之必要宣傳一樣。施行解剖手術之際，病人不免流血，不免痛苦，這就和革命之必要流血痛苦一樣。施行解剖手術之際，如果不慎，往往使病人的痛苦延長，甚至痛苦增加，這就和革命之際，方法不善，必致延長或增加國民痛苦一樣。醫生的大意，是不要病人受痛苦的，然不施行解剖術，無痊癒之望，故祇能使病人稍受痛苦，以求痊癒，這就和革命之以犧牲為幸福的代價一樣。所以革命者之於民衆，猶之醫生之於病人，第一要他知道為什麼要革命，第二要他知道如何革命，這裏頭固貴乎有知識有技能，而尤貴乎有熱誠有道德。

如上所說，可知道革命之所以發生，是那時代需要革命，詳言之，是那時代，國家已陷於危急

存亡，除了革命，沒有其他救治的方法，所以纔發生革命。不過時代的需要，往往不容易顯出，所以纔須研究怎樣使人知道需要，和怎樣使人得着需要，革命運動之艱難百折，委曲繁重，皆由於此。祇因為既有此事實，便不得不然，假如沒有此事實，而硬去革命，便和將一箇無病的人，硬抬入解剖室一般，那就成了笑話了。

第二節 中國以前發生革命之原因

中國以前何以會發生革命呢，中國四十多年的歷史，往往有革命的事實，中國人民之能革命，已於歷史上得了證明，至於中國人民之何以要革命，也於歷史上得了回答。

先就民族來說，拿歷史來看，可以說中華民族確是能夠獨立的經過四千多年，他還能巍然存在，國家雖然給人亡過，民族決不會亡過，對於異民族的壓迫，往往能將他們同化了去，不然便終於把他們驅除了去，如殷之熏鬻，周之玁狁，漢之匈奴，都不曾和中華民族鬥爭過，然至多受他的騷擾而已。不但民族沒受影響，國家也沒受多大影響，東晉的時候，五胡亂華，國家便亡了一半，但民族依然存在，南宋的時候，女真入寇，國家便亡了一大半，但民族依然存在，及至蒙古入寇，中國整箇的國家便都給他亡掉了，但民族卻還是不會亡掉，及至滿洲入寇，中國整箇國家又給他

亡掉了，但民族卻還是不會亡掉。中國亡於蒙古九十多年，亡於滿洲二百六十多年，何以國家雖亡而民族尚存，因為中國自有歷史以來，和異民族相遇，祇有政治上，軍事上的失敗，沒有文化上，經濟上的失敗，我們要知道，政治軍事，是國家所以存在的條件，文化經濟，是民族所以存在的條件，我們在政治上，軍事上雖失敗，而文化上，經濟上卻沒有失敗，所以國家雖亡，而民族不亡。民族既然存在，當他們政治軍事勢力強盛的時候，以文化經濟做自己民族的掩護，等到他們政治軍事勢力衰弱的時候，便起來將他們驅逐，恢復自己已亡的國家，到那時候，他們不是驅逐了去，便是同化於我為一民族了。

就民權來說，拿歷史來看，中國國家雖沒有民權的制度，中國人民，卻不能說沒有民權的思想，孔子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又說：民為貴，君為輕，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其他類此的話，在古人典籍中，往往看見，黃梨洲原君一篇，說得更為透澈。中國人民，因為有此思想，所以對於君主暴虐無道，民不堪命的時候，人民便會起來革命，好像是天然的道理，和人民正當的權利一般，便是歷史家也承認人民有此權利。對於秦二世，隋煬帝等時代，人民革命，都左袒人民，不左袒君主，所以我們雖

然不能說中國國家有民權的制度，卻不能不說中國人民，沒有民權的思想。

就民生來說，凡是人民要求革命，其最大原因，都是由於生計之壓迫。拿歷史來看，所有革命表面上是原因於君主之無道，政治之腐敗，實際上，卻是因為君主無道，政治腐敗的結果，以致人民生活，沒有保障，社會經濟，備受壓迫，一般人民，窮無所之，遂不得不挺而走險。歷朝末造，所醞釀出來的革命，沒有不是如此的。試拿明朝來說，明朝之亡，人都知道是亡於滿洲，然使那時沒有李自成張獻忠一般盜賊，擾亂西北。明朝還不至沒有餘力對付滿洲。李自成張獻忠做賊的原因，由於搶米，所以當時有米賊的綽號，當時西北一帶，民窮財盡，於此可見。西北一帶，所以民窮財盡的原因，卻因為倭寇擾亂東南，不能不竭西北之財力，以轉輸軍費。然則東南荼毒，延及西北，以致東北亦受其弊。由此說來，革命原因，實發原於民生問題，真是古今中外，所莫能外，不過沒有民生主義來解決他，所以止於大亂一場，得不到長治久安的結果便了。

如此說來，中國從前所以發生革命，完全由於時代需要，不過一般人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於為什麼要革命，既不甚明白，於如何去革命，更不甚講求，自然得不到革命的完滿效果，祇弄成一治一亂的局面，其實所謂治，不過久亂之後，人思寧息，所謂亂，也不過醞釀既久，偶然爆發，

需要革命的原因，是無時不存在的。

第三節 中國最近發生革命運動之原因

中國以前之革命，其原因已如上述，所以最近之革命，其必要與可能，絕無疑義。就民族來說，中國從前既然能驅除蒙古，自然必能驅除滿洲。就民權來說，以滿洲最近數十年來，君主之無道，政治之腐敗，自然會發生革命。就民生來說，最近數十年來，民生之凋敝，社會之枯窘，自然會逼一般人民走向革命那一條路去，這真是二十四史上，一箇依樣葫蘆，絕不會有例外的。祇是最近數十年來，中國之革命運動，和以前之革命，有大大不同的一點，這一點是什麼哩？是中國最近數十年來之環境。中國最近數十年來之環境，是以前所沒有的，上頭說過，中國四千年來，與異民族相遇，祇有政治上，軍事上之失敗，沒有文化上經濟上之失敗。卻是最近數十年來，所遇着的民族，和以前絕不相同，他們有所謂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之根據，固在於修明政治，強固軍事，尤在於經濟之發展，而文化之發展，與經濟之發展，互為因果，例如十九世紀以來，英國因為工商業發達便勤求製造，發明機器，結科學發達，使歐洲文化，煥然一新。又因為文化發達，便出產豐富，交通便利，結果工商業發達，其勢力普及於世界。論起政治修明，軍事強固，經濟發展，文化昌明，本來不是壞

事，寧可說，凡是國家，凡是人民，皆當致力於此，無如那時代英國及歐洲各國的生產制度，完全建築於私人土地資本之上，以致生產機關，為私人所壟斷，生產利益，也為私人所壟斷，所謂文化與經濟，成爲私人之享樂品，所謂政治軍事成爲私人之保障物。少數私人得此憑藉，對於國內，便壓迫一般勞苦民衆，對於國外，便壓迫一般異民族，對於異民族及其所居住之土地，創出一箇殖民地的名詞，將殖民地人民的勞力，及土地的生產，滿他掠奪原料的慾望，同時利用這些原料，製成商品，銷售於殖民地，供他榨取利益的慾望。這兩重慾望，向殖民地取夾攻的形勢，真是威逼利誘，無所不至。從前所謂亡國，政治上軍事上失敗便算了，如今殖民地主義，所謂政治軍事不過是一種手段，其目的乃在於經濟之吸收經濟枯窘，文化自然也便枯窘，所以其結果，不止亡國，真是滅種。最先夷爲殖民地的是美洲，其次非洲及印度，其次澳洲及南洋羣島，其次自然是東亞了。中國和這些帝國主義相遇，不但政治上軍事上發生劇烈的鬥爭，經濟上文化上也發生劇烈的鬥爭，不但決國家的存亡，而且決種族的存滅。此種劇烈的鬥爭，以鴉片戰爭爲開幕，直至今日劇烈的程度，有增無減。

如此一來，中國最近之革命運動，除了以前革命所有的各種原因，依然存在之外，還添了一

種新的原因，這一種新的原因，比之以前更爲嚴重，更爲迫切，所以中國最近時代需要革命，比之以前，其程度何止百倍加甚。換句話說，從前革命推倒無道君主及異民族侵掠，便算滿足，如今革命，卻是要推倒帝國主義。

第四節 中國最近革命運動與時代背景

照以前所說，中國最近需要革命，已無疑義，祇是如何纔能顯出這需要呢，換句話說，便是如何纔使人知道需要呢。

說到這裏，我們對於創始中國革命運動之先知先覺，本黨總理孫先生，當表敬意。

今年三月十二日，孫先生卒於北京，遺囑第一句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今年是西歷一九二五年，上溯四十年，是一八八五年距鴉片戰爭，已四十五年了。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曾發生過一回革命，是爲太平天國之役，在中國革命史上，雖然放出異彩，但其大體，究竟和劉宋朱明差不多，只能算入中國以前的革命之範圍裏。中國最近革命之第一幕，不能不說是一八八五年，那年孫先生立志顛覆清廷，創建民國，是爲第一時期的開始。由此十年至一八九五年，孫先生起第一次革命軍於廣州，是爲第二時期的開始。由此十年至一九〇五年孫先生成立中國同盟

會本部，是爲第三時期的開始。由此十年至一九一五年孫先生統率中華革命黨與軍閥及帝國主義苦鬥，是爲第四時期的開始。由此十年至一九二五年孫先生遺命中國國民黨繼續國民革命的工作，這可說是第五時期的開始了。以上四十年，劃分做四個時期。每一時期爲十年，并非有如此明瞭整齊的劃分，不過爲讀者容易記憶起見。然劃分的大體，也還不錯，更有可以幫助讀者記憶的，就是一八八五年的時候，有中法戰爭及媾和。一八九五年的時候，有中日戰爭及媾和。一九〇五年的時候，有日俄戰爭。一九一五年的時候，有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一九二五年的時候，有青島，九江，漢口，上海，廣州各處慘殺案。這些帝國主義的侵略狀況，恰恰與國民革命的運動，作一對照，更容易發人深省，使人得明瞭而深刻的印象，還有可以助讀者記憶的，今年爲一九二五年，歲在乙丑，上溯十年，歲在乙卯，上溯十年，歲在乙巳，上溯十年，歲在乙未，上溯十年，歲在乙酉。整整的四十年，我們知道，這四十年內，中國的革命運動，是怎樣的，時代背景，又是怎樣的，便可知道，那時代怎樣需要革命，與革命怎樣適應於時代之需要了。

(甲) 第一時期

距今四十年前，孫先生立志顛覆清廷，創建民國的時候，也就是中法戰爭的時候，那時代背

景，是怎樣的，試述如左。

一、外交方面 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者，爲取得經濟侵略的基礎，不斷的用軍事侵略，爲達到目的之手段，英法聯軍攻破廣州之役，及攻破天津北京之役，都是用這種手段的特徵。自從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締結以後，滿洲政府，對於帝國主義，不敢輕開戰釁，而帝國主義，在中國亦已取得經濟侵畧的基礎，覺得不必再用軍事侵畧，已可達到目的，於是變換手段，由威逼而利誘，以買收滿洲政府之心，這種攻心政策，較之戰爭，更加利害。英國遣洋槍隊，幫助滿洲政府，打倒太平天國，以致滿洲政府，感激英國，事事順從，這便是最著的例，在那時候，滿洲政府，早已把破北京，燒圓明園一場惡劇，付之九霄雲外了，況且在那時候，太平天國，已被打倒，滿洲政府，自命中興，一般君臣，興高彩烈，方以爲子孫萬年之業，從此無憂，須知道，革命之發生，總在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一般人民，憂心宗國，岌岌然不可終日，方纔不惜犧牲流血，如今既歌舞太平不暇，又何從感覺革命之必要呢。

二、軍事方面 太平天國，被滿洲政府打倒是由於曾國藩李鴻章一般人，練什麼湘軍淮軍，効忠滿洲政府，所以得最後的戰勝。自此之後，湘淮諸軍，得了翊贊中興的名譽，一直到乙酉中法

之役，這種名譽，還是維持，在此役，中國軍隊，并沒甚敗仗，諒山之戰，還打了勝仗。中國軍隊的腐敗，還沒有十分暴露，滿洲政府的威信，還沒有十分倒覆。從來革命之發生總在政府失了威信之後，人民覺得政府沒有什麼可怕，而作惡如故，方纔容易發生反動，如今滿洲政府既然還能維持威信，革命的可能，便沒有十分把握了。

三、社會方面 革命是一件革故鼎新的大事，最近革命，在民族民權民生三方面，澈底改造，尤其是大事中之大事，倘使人民對於改造，沒有極大的覺悟和決心，革命是沒有可能的。中法戰爭的時候，中國人民的心理，是如何呢？先就物質文明來說：自從鴉片戰爭以來，海禁大開，歐洲一切工藝品次第輸入，至少可使國人對於物質文明得一認識，知道機器製造品，非手工業製造品所能望了。然而異民族間相遇，彼此都不免有排拒的感情，在各有文明的異民族間相遇為尤甚，在四千年來，以文明自負的中華民族，更其特別加甚，所以當時一般國人，對於歐洲之物質文明，竟會不能認識。如今試述一兩件事，曾國藩和太平天國打仗，最得力的是水師，他的水師，是他所手創，有長龍快蟹等等名目，縱橫長江上下，得意非凡。他做兩江總督的時候，有一日在安慶城樓上，憑觀水師，正在神遊目想之際，忽然的有一條英國小火輪，風馳而過，那些長龍快蟹，一霎時便

浮沉不定起來，曾國藩看見了，心頭一急，便吐了一口血，這是曾國藩的聰敏過人，他自從見了這小火輪，知道自己幾十年辛勤訓練的水師，全靠不住，所以後來他便派五百學生到美國去留學，在上海和南京設立製造局，提倡格致。曾國藩這箇人算是對於物質文明，能夠認識的。李鴻章因為曾經利用英人戈登的洋槍隊，打破太平天國的李秀成，所以對於物質文明，也能夠認識，只是當時的一般士大夫，能夠如曾李二人的，實在是最少數。不用說別的，即如彭玉麟之流，他帶慣了長江水師，他便說長龍快蟹，比小火輪還要便捷，他們不只反對輪船，他們還要反對鐵路，當時吳淞新築鐵路，恰巧上海發生瘟疫，他們硬說瘟疫是鐵路惹來的，將鐵路拆了下來，投之江中，以輪船和舢板比較，以汽車和獨木輪車比較，這樣簡單地事實，他們尚且認識不清楚，其他一切物質文明，不能認識，更何待說。對於物質文明，尚且不能認識，則對於精神文明，如倫理道德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等等，其不能認識，越發不用說了，所以當時日本雖然已經全副精神去做維新事業，而中國依然糊糊塗塗的，在那裏混日子，男子儘管講究做八股，女子儘管講究纏小腳，此外什麼事都不管，須知道革命之發生，由於精神生活，生了變動，對於國家社會，覺得有改造的必要，纔會有破壞的決心和建設的希望，像那時候社會方面，如此混沌，那裏有革命發生的可能呢。

照以上所說，可知道在乙酉中法戰爭的當時，中國社會實在沒有發生革命的可能，雖然自從鴉片戰爭以來，革命的需要，已經非常迫切，而在這般社會裏，實在無從着手。我們論到這裏，不能不佩服孫先生的先知先覺，他在那時候，只有二十歲左右，他看破了中國的情狀，立志顛覆清廷，創建民國，因中法戰爭一役，知道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侵略的劇烈，萬萬不能坐視，又知道滿洲政府，若不推倒，則反對帝國主義的工作，無從做起，他顛覆清廷的思想，是從此得來的。一半是鑒於目前形勢，一半是繼承中國民族固有的思想，他創建民國的思想，卻是從幼時在檀香山一帶，看見美國民主政治的模樣，加以研究英文的結果，知道世界的大勢，和民主主義的潮流，又因為研究中國歷史的結果，知道歷朝革命所費時費力的，不在乎推翻舊政府，而在乎革命之後，羣雄角立，人人抱著爭王爭帝的思想，所以亂箇不休，惟有創建民國，纔可以免此禍患，如此說來，孫先生在那時候，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已經確立了。

只是在當時社會中，以何憑藉來實現這般理想呢？明亡之後，中國的民族主義，寄存於兩派人物之中，一大派是讀書人，從前所謂士大夫，如今所謂知識階級，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諸先生，為之領袖，能將民族主義普及於一般讀書人心裏，但是不久便被什麼博學鴻詞科，將一般讀

書人都驅了去了，有了翰林進士尙書侍郎，還管什麼民族主義，及至太平天國出來，一般讀書人，還抱定了『君臣之義已定，夷夏之辯不容再存諸心』的思想，拚命幫助滿洲政府，來打倒太平天國，如今正是歌舞中興的時候，這一大派人如何可以和他說革命呢？又一派是勞働者，從前所謂下流社會，如今所謂勞苦民衆，陳近南先生爲之領袖，能將民族主義普及於一般勞働者的心裏，創立了三合會，三點會，天地會等秘密團體，以『清復明爲口號』，他們不是讀書人，沒有翰林進士尙書侍郎等願望，所以民族主義，在他們社會裏，比較能夠固結。二百六十多年來，他們對於滿洲政府，起了不少的反抗，太平天國一役，更是發揮盡致，及至太平天國敗了，什麼哥老會等，都被一般所謂中興名臣買收了，論起來，不讀書便不容易做官，這是他們的好處，然而因不讀書，便沒有知識，便容易被人利用，這是他們的壞處，雖然是總比讀書人好得多，然而在那時候，民族主義在他們社會裏，已成死灰，又此何可以和他說革命呢？

照此說來，孫先生在那時候，要做革命，可以說毫無憑藉。縱使勉強做去，必然失敗，無可疑的，但是革命的最大的本領，便是不顧目前的失敗，以求將來的成功，所以孫先生在那時候，明明知道失敗，卻偏要拚命做去，他在士大夫社會和勞働者社會，用了不少的力去做革命的宣傳和組織，

他落得了一箇瘋癲神經病的徽號，能贊成他的不過是少數的幾箇人。他在這時候，除了在香港澳門廣州秘密運動之外，他還周歷長江一帶，直至北京蒙古，實地觀察中國大勢，和社會情狀，以儲蓄他革命的勢。所以自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五年，這十年之間，只能名爲革命醞釀時期，在這時期之中，孫先生的著作，只有一篇給李鴻章的信，有人看見了這一封信，便以爲孫先生當時的政治思想，還不過是一些富國強兵的政策，還不會有顛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其實這些不過是孫先生表面的文章。他既然要周行內地，深入北京，自然不免要有這外交手段，不但致李鴻章的信是如此，便是當時所謂興中會的章程，也深藏革命的色彩，這是秘密結社秘密行動應有的事。要知道孫先生當時真正的志尙，當以他所自著的孫文學說，第八章爲斷。

在第一時期，卽革命醞釀時期，雖沒有什麼顯著的事實可記，然卻有顯著的意義，可以使我們認識的，一是革命的人應該有極銳利的目光，看出時代的需要，二是看出之後，便要領着羣衆向前去做，不要以爲那時代尙不能做，便不去做，這叫做適應時代，也叫做促進時代。

(乙) 第二時期

一八九五年，孫先生起第一次革命軍於廣州，那年是歲在乙未，正是有名的甲午中日戰爭

的翌年，那時代背景，是怎樣的，試述如左。

一、外交方面 乙酉中法戰爭之役，中國的外交方面，雖然是隱患潛伏，還沒有到爆裂的時候。由此十年至於甲午，中日戰爭，外交上的形勢，便不同了，滿洲政府之腐敗無能，已完全暴露於世界。而且甲午中日戰爭之役，日本以一戰而得了賠款二萬萬及割讓台灣澎湖列島種種權利，使各國輕視中國之心，和貪得無厭之欲，一齊並發。於是始而瓜分海港，德國占領膠州灣，俄國占領旅順大連灣，英國占領威海衛，法國占領廣州灣，英國又占領九龍，繼而預備瓜分，各省劃定所謂勢力範圍，英國要求揚子江各省不割讓於他國，法國對於兩廣雲南，日本對於福建，也有同樣的要求，俄國於東北各省，德國於山東，雖沒有要求的形式，而事實已經存在，及至庚子之役，八國聯軍，打破北京，辛丑議和，締結了空前恥辱及喪失權利的條約，又因為俄國在東三省不撤兵的原故，引起了日俄戰爭，中國對於人家在自己領土裏戰爭，卻宣布中立，中國的沒有能力，可以自主獨立，已經成爲不可掩的事實。總而言之，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五年，這十年間中國的外交，可說是倒霉至於極點，在這種外交情勢之下，無論中國人民，平日如何自尊自大，至此也覺得創鉅痛深，不可終日，人民既然有此心理，對於革命需要的感覺，比第一時期自然較爲容易了。

二. 軍事方面 在第一時期裏已經說過，從來革命之發生，總在政府失了威信之後，乙酉中法之戰，中國還沒有大敗，所以滿洲政府的威信，尙能維持，甲午中日戰爭之役卻不然了，湘淮諸軍，望風奔潰，如秋風之掃落葉，即所謂北洋新軍，及北洋艦隊，亦大敗虧輸，滿洲政府之威信，從此掃地，以後索性連海軍衙門都裁去了。德國占領膠州灣之後，對於各國的任意宰割，吞聲忍受，不敢稍有抵抗，庚子之役，想以練拳念咒抵禦大礮機關槍，以至京城打破，連夜西奔，自此以後，全國人民都知道滿洲政府不是東西，並且知道若不將他驅除，整個中國必然被他斷送。及至日俄戰爭，直接將他的老家作爲戰場，他也毫不在意，更使中國人民看他不起。在這種情狀之下，革命之發生，比第一時期，自然覺得可能了。

三. 社會方面 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沒有幾年，便發生戊戌的維新變法，這種不徹底的改革，與中國的前途，固然不會發生什麼影響，然而這也是時代的過程上所不能免的。雖有己亥的一番反動，卻於庚子之役，使維新變法得了必要的證明，在那時候，物質文明上和歐洲比較，自知不如，已不必說。便是精神文明上，如倫理道德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等等，對於舊有的，都起了懷疑，同時對於歐洲輸入的，便生了接受的傾向了。在這時候，發生革命，比起第一時期的確容易得多，在

這時候，所須注意的便是不要給不徹底的改革，牽絆住革命的進行。因為革命的進行，如能不受牽絆，則此種不徹底的改革，對於革命的進行，實是無意之中，與以不少的援助的。

照以上所說，可知由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五年，十年之間，是中國受極大的打擊，蒙極大的損失的時候。同時也就是中國人民，受極大的激刺，生出極大的變動的時候。孫先生在這十年之間，先後起過兩次革命軍。第一次是在廣州，正在甲午戰爭之翌年，第二次在惠州，恰與庚子聯軍之役，同在一年，第一次革命軍在廣州起事未成，損失了陸皓東一般同志，因為正在甲午戰爭之後，一般人民，雖然不懂得革命的意義，卻已經懂得中國的危急。所以孫先生的革命行動，不復如第一時期，目為瘋癲神經病，而另換了大逆不道，謀反作亂等等徽號了。第二次的革命軍在惠州轉戰數月，滿洲政府的軍隊，望見革命軍的旗幟，便心驚膽破，加以那時史堅如在廣州省城，謀為惠州革命軍的響應，埋伏地雷，攻擊兩廣總督衙門，事雖未成，已經使德壽一般人喪失了魂魄，這第二次的革命軍，論勢力比第一次的革命軍大得多，論影響也大得多。那時候正值滿洲政府迷信義和拳，將京城鬧得昏天黑地，而他們人民對於滿洲政府，輕視憤恨，已經到了極點，所以對於孫先生的革命行動，由大逆不道，謀反作亂等等徽號，而變為救國志士等等徽號了。

這第二時期，可名為革命萌芽時期，比起第一時期的確確，是得了一些進步。我們推究所以得了這一些進步的原因，可以說是時代促進革命，也可以說是革命促進時代，因為社會受了激刺，生了變化，使革命發生，得所憑藉，故叫做時代促進革命。因為革命黨人，猛向前進，努力不已，使社會覺悟得快，同時使時代進步得快，這叫做革命促進時代。兩者比較，還是革命促進時代更為重要。假使革命不去促進時代，而等時代去促進革命，則革命的進步，必然遲慢，而進步時所遇着的種種障礙，也必然不能立時掃除。阻誤了革命的進步，同時也就阻誤時代的進步。

試看孫先生在第一時期，絕無發生革命可能的時候，而努力革命，因以有第一次的革命軍之發生。在第一次的革命軍失敗以後，努力不已，因以有第二次的革命軍之發生。我們估量革命之進步，固然不要忘了是受時代的進步之援助，然而試想在那時代，如果沒有革命運動，做中堅骨幹，如何能使泄泄沓沓的人心為之振起，更如何能使不澈底的改革，失了牽絆時代的進步之効力，更何能以革命供給時代的需要呢。所以革命黨人，認清楚了時代與革命之關係，要以決心與勇氣進行革命無稍間斷，這是對於革命之責任，也就是對於時代之責任。

(丙) 第二時期

一九〇五年，中國同盟會成立本部，舉孫先生爲總理，那年是歲在乙巳，正在有名的日俄戰爭最激烈的時候，那時代背景，是怎樣的，試述如左。

一、外交方面 鴉片戰爭以後，庚子聯軍之役以前，滿洲政府對於各國，雖不免有媚外的行爲，然大體卻是仇外，庚子以後，便由仇外一變而爲媚外了。滿洲政府，既然專以媚外爲事，所以各國的武力侵略政策，已用不着，完全以經濟侵略，達到帝國主義之目的。所以庚子以後，數年之間，中國的外交形勢，似乎是風平浪靜，然而英德法的三國銀行團，英德法美的四國銀行團，已在中國樹立了經濟侵略之最大基礎。民國以後，加入日俄成爲六國銀行團，既而美國退出，成爲五國銀行團，侵略政策，既由武力而移經濟，所以各國對於中國的口號，乃由瓜分而移於共管了。

二、軍事方面 庚子以後，滿洲政府汲汲於練新軍，有人問他道練新軍做什麼用呢，他答道，所以防家賊的，這一句話，可以代表滿洲政府未造的心理，總而言之，在那時候，滿洲政府的軍備，非所以對外，乃所以對內。換句話說，非所以對付帝國主義，乃所以對付革命黨，滿洲政府之情見勢絀，革命黨祇勇往直前，於此可以概見。滿洲政府之練新軍，說所以防家賊，誰知因爲練新軍的結果，將無數革命黨人參入行伍中去，於是軍隊反正，遂爲滿洲政府之致命傷，這是滿洲政府所

不及料的。

三、社會方面 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五年，十年之間，社會方面所發生的是維新與守舊的問題，一五年以後，守舊不成問題了，另換了革命與君主立憲的問題，在那時候，革命派與君主立憲派之激戰，宛如從前維新派與守舊派之激戰一般，終之君主立憲派不澈底的思想，敵不過革命派澈底的思想，理論上既說不過革命派，實行上，又不如革命派之勇猛精進，所以幾年之間，滿洲政府，還沒有倒，君主立憲派，已經聲嘶力竭了。

照以上所說，可知道一九〇五年以後，革命運動，已由萌芽時期，入於進行時期。就一九〇五年來說，革命運動，已樹立之一箇堅固偉大的基礎，便是中國同盟會之成立，在中國同盟會成立以前，如興中會，雖是以革命爲目的的團體，但是黨的組織，還沒有完備。自從中國同盟會成立以後，方纔有所謂黨。除了孫先生所創的興中會一派之外，還有黃克強所創的華興會，蔡子民所手創的光復會，以及十七省的革命分子，一齊加入，結爲一箇團體。舉孫先生做總理，各箇黨員，本於通力合作的精神，分頭做事，於本部之外，並成立了多數的支部。黨的組織，日益進步，而黨之宣傳，也隨以俱進，宣傳的總機關有民報，其餘海內外各報，無論是日報，是旬報，是月報，都是將黨

的主義，向民衆極力宣傳。所以自一九〇五年以後，革命事業，成爲有條理，有系統進行。一九〇六年，便有萍鄉醴陵之革命軍，接着又有潮州黃崗惠州欽州廉州鎮南關河口等處之革命軍。此外還有軍隊反正，如廣州新軍，安慶新軍等。又有暗殺的組織，如徐錫麟之刺恩銘，吳越之刺王大臣，熊成基之刺載洵，汪精衛等之刺攝政王，溫生才之刺孚琦，陳敬岳之刺李準等等。可以說道，自從中國同盟會成立以後，幾年之間，革命黨人所流之血，連續不斷的，灑遍於中國各處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事雖未成，而其精神實足以感動民衆。所以同年八月十九日之役，武漢起義，全國各省，次第響應，數箇月的工夫，便造成清帝退位，民國統一的大業。這是決非偶然的，革命促進時代的功効，於此大見。

(丁) 第四時期

民國元年以後，至於今日，時代背景，是怎樣的，試述如左。

一、外交方面 辛亥革命以前，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革命運動，似乎不大注意，似乎以爲中國革命運動，是不會成功的。及至辛亥革命，始猛然吃了一嚇，最先是日本政客，極力主張中國橫分爲二，南方共和，北方帝制，以期減削中國革命的勢力，跟着便是英國在國會提議，從前已讓日

本在東方出頭，如今不可讓中華民國在東方出頭，恰好在那時候，孫先生卸任臨時大總統，在上海租界裏外國人的歡迎會演說，劈頭一句，便是收回租界，於是一般帝國主義者，恍然知道中國革命之目的，不僅在驅除滿洲，而尤在對抗帝國主義了。於是一般帝國主義者，相約起來，一致行動，其惟一目的，便在扼此新生嬰兒中華民國之吭，而制其死命。六國銀行團，於以成立，一方面定出極嚴酷的借款條件和擔保品，使中國經濟之權，歸其掌握。一方面利用這些借款，資助軍閥，養成反革命的勢力，以阻革命的勢力，從這兩條政策，民國元年，定了下來，至於今日，絲毫無改，袁世凱於民國二年以後，何以能將國內的革命黨趕盡殺絕呢？是因為有五國銀行二萬五千萬的大借款，段祺瑞於民國六七年來，何以的將國內的革命黨殺得四分五裂呢？是因為有日本三萬萬的大借款，曹錕吳佩孚於民國九十年來，何以能悍然自命，要殺盡革命黨的種子呢？是因為有英美半明半暗的各種借款，其數目至今還沒有算清，段祺瑞於民國十三四年間，何以能死灰復燃，又與革命黨為敵呢？是因為有日本半明半暗的各種借款，以及金佛郎案等等。民國以來的外交現象，一言蔽之，帝國主義勾結軍閥之現象而已。

二、軍事方面 民國元年以後，袁世凱擁着一部分殘餘的兵力，藉着帝國主義的幫助，日復

一日的擴充起來，成就了所謂北洋軍閥。及袁世凱死了，手下一般家將，支解了袁世凱的勢力，宛如董卓死了，李催郭汜樊稠張濟蜂擁起來一般，這筆爛賬，直至今日，還沒結算，北方既然如此。南方當初，雖然是革命的根據地，然而因為受了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兩重壓迫，一時支持不住，崛強的或死或逃，柔懦的便不免降服了。從此以後，北方反革命的成爲大軍閥，南方變節的革命黨人，成爲小軍閥，大軍閥志在把持中央，便倡言統一，小軍閥志在割據地方，便倡言聯省自治，十四年來，窮兵黷武，日有所聞，驕兵悍將，觸目皆是，生生的把一箇中華民國做弄得暗無天日。

三、社會方面 民國元年之初，中國社會確是有一種朝氣，倘使這種朝氣，日蒸月上，仍然可以做出種種改造事業，無如這種朝氣，一剎那間便被軍閥與帝國主義勾結的現象，拖蓋住了，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中國，中國的手工業，漸漸爲機器工業所破壞，加以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中國工業，更沒有振興的機會，於是出口貨日少，入口貨日多，全國以內，土貨日少，洋貨日多，這些現象，祇有最久逾深。起初的時候，還沒覺得，最近數年，便不由得不覺得了，民窮財盡，已經成了急轉直下的趨勢，再加以軍閥縱橫，政治黑暗，財政割裂，越發民不聊生。古人說得好，富然後教，如今生計上既受這般壓迫，一切精神上的文明，從何說起哩。祇有窮奢極侈的舶來品，

向奄奄垂盡的人民，不絕的引誘，和療病的人，偏重淫樂一般。社會方面的受病，幾於不可救治了。

照以上所說，可知道民國成立以後，十四年間，革命運動，反由進行時期，入於頓挫時期。在這時期，革命運動，所受的壓迫，所遇的障礙，比民國成立以前，困難何止倍蓰。在這頓挫時期中，革命黨人，恍如孤軍，入了重圍，除了力戰而死的，能保存他的革命人格之外，其餘或是潰圍而去，落荒而走，或是屈了雙膝，向敵人投降。在這頓挫時期中，能堅持着革命的旗幟，始終不變的，祇有一箇孫先生，和他的極少數的信徒。他起初與袁世凱爲敵，始敗而終勝，繼而與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曹琨，吳佩孚爲敵，也是始敗而終勝。至於始爲同志，繼爲敵人，如陳炯明等等，更不用說了。然而以上的敵人，都不是他真正的敵人。他真正的敵人，是帝國主義。以上的敵人，不過是帝國主義之工具而已。看了四十年奮鬥的歷史，便可明白，看了四十年時代背景，便更可明白。他積了四十年奮鬥的經驗，和看破了四十年時代背景，知道欲以孤軍制勝此敵人，第一着手，就整頓內部，所以他始而組織興中會，繼以組織中國同盟會，極力做整頓的工夫。至於民國元年時代的國民黨，原不是他所願意組織的，所以二年以後，便改組爲中華革命黨，八年以後，又改組爲中國國民黨，十二年以後，中國國民黨的名詞，雖沒有改變，而其組織與紀律，卻大大的改變。這種改變，是使內

部益加嚴密，同時又益加擴充，就嚴密來說，他淘汰了一切反革命的分
子，使內部純為革命的分
子，就擴充來說，他注意於接近民衆，和世界上革命的先進，被壓迫的
民族，被壓迫的級階，聯合戰
線，以上種種，整頓內部的計劃，無非欲使此革命團體，能適應時代，
能促進時代，以求革命最後之
成功。我們於此，可以說道，民國元年以後，革命運動，雖然由進行
時期入於頓挫時期。而民國十二
年以後，革命運動，已由頓挫時期，而入於激進時期了。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6 62648



410438